

## 文獻文化學及其方法學省思 ——以四庫文化學為例\*

蔡智力\*\*

### 摘要

四庫學發展至今，似仍缺乏應有的「理論自覺」和理論系統，這使四庫學研究仍處於一種相對疏慵的狀態。本文即基於此問題意識，順沿周積明先生四庫文化學的思路，在文獻文化學的總體範疇之觀照下，對四庫文化學再作一理論省思。第一節提出問題。第二節討論文獻文化學的可能性，其中先討論文化對文獻的制約性此一基本假定，及在此一基本假定下隱含的雙向詮釋進徑，再以四庫文化學為例，檢討其對文獻符碼詮釋功能與文化學理論的實際應用之忽略。第三節在理論省思的基礎上，反思四庫文化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先就學術史與思想史兩個深淺不同的層面分析四庫文化學在文化史研究上的廣度累積，再討論四庫文化學目前有逐漸轉向文化學研究的趨勢，但仍有待深入推進。第四節作結語。

**關鍵詞：**文獻文化學、四庫文化學、四庫學、四庫全書、理論省思

---

\* 「文獻文化學」概念的構思，是在周積明、吳哲夫兩位恩師的啟發與引導下逐漸形成的，拙文撰稿時亦惠承兩位老師悉心指導。初稿在天主教輔仁大學「群學廣談」讀書會上提出討論，渥蒙顏崑陽老師細緻批改，並惠賜諸多睿見；後於「第二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主辦，2017年6月17-18日）上宣讀大綱，承蒙評論人何宗美先生惠予賜教。投稿時又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賜閱全稿，並惠賜許多卓見，均受益良夥，揣此一併鄭重申謝。惟一切文責，則仍由作者自負。

\*\* 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一、問題的提出

臺灣商務印書館計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之際，昌彼得（1921-2011）先生曾撰〈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一文稱：

因為《四庫全書》收錄的繁富，修纂的過程又極複雜，故近代頗有專門研究其書的。或研究《四庫》纂修的經過，或輯錄有關《四庫全書》的檔案，或研究《四庫》禁燬的情形，或研究《四庫》著錄圖書的版本，或考證《四庫》提要的謬誤，故有「四庫學」之名。<sup>1</sup>

此後不久，劉兆祐先生也提出了「四庫學」的概念。<sup>2</sup> 這大概是「四庫學」一名之所來自。<sup>3</sup>

「四庫學」一名之被提出，至今已三十餘年。然而，四庫學是否足以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則仍然頗具爭議。<sup>4</sup> 理論的欠缺或薄弱，即其中關鍵所在。因而，針對四庫學的發展，不少學者都發出「理論自覺」的呼籲。<sup>5</sup> 就其自身發展理路而言，四庫學是否已具備理論自覺的條件？

<sup>1</sup> 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故宮季刊》第 17 卷第 2 期（1982 年冬季），頁 37。後亦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書前。

<sup>2</sup> 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漢學研究通訊》第 2 卷第 3 期（1983 年 7 月），頁 146。

<sup>3</sup> 相關過程，亦可參考昌彼得，〈「四庫學」的展望〉，收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i；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清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頁 50。

<sup>4</sup> 如林志宏即對「四庫學」一詞表示「未必完全同意」。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7 期（2012 年 9 月），頁 63。

<sup>5</sup> 何宗美，〈四庫學建構的思考〉，《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1 期，頁 175-179；朱仁天，〈「四庫學」，還是「四庫總目學」？〉，收入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主辦，「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會議」會議論文（湖南：2016 年 6 月 5-6 日），頁 237-241。

四庫學作為針對《四庫全書》及相關文獻的研究，其名謂之提出雖僅三十餘年，而其歷史實亦非短。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後，南三閣《全書》告竣，並陸續頒發藏度，供地方士子「借抄」，<sup>6</sup>《四庫全書》由此便開始進入普通士人的視野，開啟其接受史。由於《四庫全書》的「欽定」性質，早期士人對其得失，都「不敢置一詞」。<sup>7</sup>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四庫學研究，實自民國以後始才漸具規模。<sup>8</sup>但亦是一時間名家輩出，如陳援庵（1880-1971）、余嘉錫（1884-1955）、胡玉縉（1859-1940）、楊家駱（1912-1991）等先賢，便率先樹立了樸學研究典範。<sup>9</sup>而1990年代以後，四庫學又在沿續傳統樸學路數的基礎上，開闢了文化史研究的新典範。

至今，四庫學之研究類型已日見多樣化，甚至針對研究成果之分類，學者亦各有見解。如在1993年海南大學召開的「中國首屆四庫全書學術研討會」上，周積明先生即於所發表之〈《四庫全書總目》研究方法論〉文末，附〈四庫學新理解〉一文，將四庫學的研究結構分為「四庫文本學」、「四庫結構學」、「四庫歷史學」與「四庫文化學」四個層面。<sup>10</sup>周先生2000年發表的〈「四庫學」：歷史與思考〉，又從

<sup>6</sup> 文宗、文匯、文瀾三閣《全書》之完竣，見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年），頁138-141。

<sup>7</sup> 余嘉錫曰：「閒嘗論之，乾、嘉諸儒於《四庫總目》不敢置一詞，間有不滿，微文譏刺而已。」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8。

<sup>8</sup> 四庫學的發展階段，參考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頁51-60。

<sup>9</sup> 周積明先生將陳、余、胡、楊四位先生譽為早期四庫學的領軍人物，而他們各自的《四庫全書考異》、《四庫提要辨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四庫全書通論》則為典範性著作。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頁52-54。

<sup>10</sup> 據周先生的構想，「四庫文本學」以《全書》與《總目》之本文為研究中心，包括傳統的刊誤、補正、考核、糾謬等；「四庫結構學」致力於研究《全書》與《總目》的內在結構、知識體系、編製方法以及各部類的相互關係與整合效應；「四庫歷史學」研究《全書》與《總目》編纂的歷史文化背景、編纂過程、館藏與傳播情況，以及館臣的經歷、觀念與文化活動等；「四庫文化學」則聚焦於《總目》所呈現之學術論、文化觀、文化影響與文化價值，以及民族文化精神與時代精神走向等。周積明，〈四庫學新理解〉，收入海南大學中國四庫

研究類型的角度分為文獻研究、史學研究與文化研究。<sup>11</sup> 此外，亦有曾守正先生的二分法：文獻考據取向與文獻詮釋取向。<sup>12</sup> 三種分類方法，均相當精準地從不同角度概括了四庫學於其時的發展型態。

但隨著四庫學的不斷深入，研究型態日益多樣化，部分研究似已溢出上述類型。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即是「四庫學」反思研究。這類研究在數量上實不可謂之已成氣候，且在性質上與上述諸類亦未必有絕對明顯的區別——只要對上述某些類型之範疇稍作調整，或許亦可將其收編。但對於四庫學發展而言，反思研究的學術意義恐怕是不容低估的，因而它們與其他論著的差異性當亦不容忽視。如前引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曾守正〈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研究芻議〉，以及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與〈「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諸文，<sup>13</sup> 對四庫學進行深入而又極具啟發性的反思，它們對於四庫學尤其是四庫文化學的意義，恐怕不亞於任何一篇具體的四庫文化學論文。因為上述論文，就其性質而言實已具備一定程度的理論自覺；而

---

全書研究中心編，《四庫全書研究——中國首屆《四庫全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海口：海南大學中國四庫全書研究中心，1994年），頁103-104。

<sup>11</sup> 據周先生的說明，史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大致與四分法相當，而文獻研究則於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文獻」的概念，其內容包括文獻及其版本的刊誤、補正、考核與糾謬，也包括工具書編纂，則似把四分法中的「文本學」納入文獻研究範疇。見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頁61。

<sup>12</sup> 前者包括《總目》內容的辨證、補撰、刊誤、續修，後者則自學術思想、史學、文學諸視域出發，詮釋《總目》隱含的觀念，或考察編纂歷程。見曾守正，〈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研究芻議〉，《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創刊號（2010年7月），頁76。

<sup>13</sup> 分見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書目季刊》第31卷第1期（1997年6月），頁14-20；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頁349-394；楊晉龍，〈「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研究時的幾個問題〉，收入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頁17-70。

與此相似的為數不少的綜述性文章，<sup>14</sup> 亦為理論自覺提供先行條件。這些論文的出現，當緣於四庫學研究的實踐積累與內在需求的共同作用。然而，真正深入而系統的理论自覺，則似未多見。

事實上，周積明先生「四庫文化學」(cultural *Siku studies*) 的提出與實踐，及其《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的影響，已為四庫學的理论建構奠定了相當的基礎，但仍有待進一步深入與系統化。因此，本文即欲順沿周積明先生的思路，提出「文獻文化學」(cultural philology) 的概念，並在其總體觀照下對四庫文化學作一理論省思。<sup>15</sup> 這對四庫學的深入發展，應具其意義。

## 二、文獻文化學可能性探討

### (一) 詮釋的雙向進徑：文獻遭遇文化的理論意義

「文獻」一詞始見於《論語·八佾》「文獻不足故也」，朱熹(1130-1200)注曰：「文，典籍也。獻，賢也。」<sup>16</sup> 「文」即古代典籍，是已基本定型的文字文本；「獻」則指當代賢人，是尚未定型的言行事蹟。但「文」與「獻」之間又並非對立關係，今日之文源自往日之獻，今日之獻又可能成為來日之文。因此，在古典文獻學中，「文

<sup>14</sup> 如鄧洪波、張洪志，〈2011-2015年四庫學研究綜述〉，《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31-37；汪受寬、劉鳳強，〈《四庫全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62-66；陳東輝，〈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第25卷第2期(2006年5月)，頁29-38。其數量之夥，不及贅述。

<sup>15</sup> 「文獻文化學」的概念及相關方法，拙文〈賦體之「式微」與文體之「滋廣」〉曾作初步探討，但未盡周詳。蔡智力，〈賦體之「式微」與文體之「滋廣」——從〈漢志〉〈隋志〉看「唐無賦」與「賦莫盛於唐」之爭〉，《輔仁國文學報》第45期(2017年10月)，頁105-109。

<sup>16</sup>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63。

獻」一詞雖同時指涉典籍與賢人，但實際上又更偏重於典籍，尤其是古代典籍。<sup>17</sup> 文獻文化學中「文獻」一詞，即取義於此。

至於「文化」概念，則更為複雜。據統計，至 1990 年代，關於「文化」的概念就有超過二百五十種之多。<sup>18</sup> 本文無意於為「文化」作一周詳的定義，但於諸多定義中，則相對傾向於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L·克魯伯（Alfred L. Kroeber, 1876-1960）和克萊德·克克霍恩（Clyde Kluckhohn, 1905-1960）所作的：「文化是由或顯或隱、且通過符號獲取與傳輸的行為模式構成，它構成了人類社羣與眾不同的成就，包括他們在人工製品中的體現；文化的本質核心是傳統觀念，尤其是其中的附加價值；文化系統一方面被認為是行動的產物，同時也是進一步行動的條件因素。」<sup>19</sup> 文化的一般性定義，是區別於自然狀態的人類社會行為及其產物。具體來說，其產物又可能有物質（人工製品）與精神（傳統觀念）兩個面向。文獻文化學所能涉及的「文化」，首先即包括圖書編纂這一具有文化意義的社會行為。而其產物亦涉及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其中物質即包含文獻典籍以及與其相關的印刷工具等人工製品；精神即涉及由語言符號所傳輸的思想、觀念，甚至是表達思想與觀念的方式，這可能是文獻文化學更為偏重的。

但總體而言，文獻文化學對「文化」的界義，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對「文化」進行必要的界義，只為了有效的論述定位。但文獻文化學理論目的的終極指向並不在於此，而在於打通文獻與文化之間雙向的詮釋進徑。然而，作為理論目的的文獻與文化之間的詮釋通道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且已頗為學界所接受。周積明先生即把《四庫全書總目》看作一部「具有特殊價值的文化史著作」，同時認為《總目》

<sup>17</sup> 參考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4。

<sup>18</sup> 李榮善，《文化學引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8。

<sup>19</sup> A. 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ambridge, Mass.: The Museum, 1952), p.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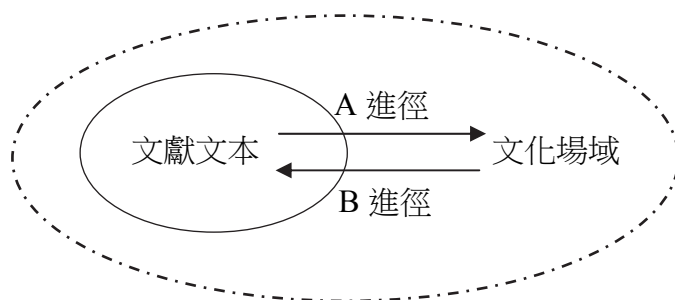
的編纂是一項具有「目的取向」或「價值取向」的主體的文化實踐活動，因而一方面其相應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性，而另一方面文獻學家受社會文化影響而形成的各種心態，亦會投射入文獻編製之中。<sup>20</sup>

然則，文獻文化學的基本假定即是，文化場域（cultural field）對文獻文本存在著某種制約性或決定性作用，<sup>21</sup> 文獻所隱含的「文本意義」（textual meaning），以及文獻學家所作出的任何編纂行為，都是文化場域中各種制約因素交互作用的投射。因此，當將文獻文本歸置於其原本所處之文化場域進行觀察時，便會產生可雙向詮釋的問題進徑：A、透過對文獻文本的分析，是否可以追溯其所處場域的文化樣態？B、在文化場域中，各種制約因素如何作用於文獻的編纂行為？（如圖一）

---

<sup>20</sup> 見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頁7-20；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頁15-19。李國新、彭池、石玉對周先生《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的評論，亦顯現如此態度。分見李國新，〈文化品性：古典目錄深層內涵的展現——評《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圖書館（雙月刊）》1993年第1期，頁68-69；彭池，〈傳統國學研究的新思路——評周積明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月刊》1992年第7期，頁74-77；石玉，〈文本解讀——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讀後〉，《江漢論壇》1992年第10期，頁81。

<sup>21</sup> 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無法擺脫「心理場」的制約與決定，正如在物理界處於電磁場中的物體會受到來自場域之力的作用一樣。參見〔德〕庫爾特·考夫卡（Kurt Koffka, 1886-1941）著，黎焯譯，《格式塔心理學原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51-64。文化也有其場域，並會以場域之力對處於其中的人類社會文化行為產生制約與決定。



圖一：文獻文化學的雙向詮釋進徑

A、B 兩個進徑都是詮釋性取向，但其詮釋方向與目標卻完全相反。A 進徑是透過對文獻編纂方法及其中所隱含的編纂行為的分析，觀察產生文本的文化場域，其詮釋目標落實在文化上。因此，這其實是將文獻文本作為文化史研究的史料，是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相對而言，B 進徑則將文獻文本置於文化場域中，透過場域中的組織結構與制約因素等關係，觀察文獻編纂行為的成因及其運作規律等問題。因此，這其實是將文獻編纂視為一種社會文化行為予以研究，從而是文化學的研究方法。<sup>22</sup>

由這兩個進徑可見，實證式的文獻考據取向並非文獻文化學的學術旨趣所在。文獻文化學以詮釋作為第一序理論目標。因此，無論文化史進徑抑或文化學進徑的研究，都要求研究者設法回歸歷史情境，作「瞭解之同情」式的觀察與分析。<sup>23</sup> 亦職此故，一方面，區別於傳

<sup>22</sup> 文化史是文化學與史學相結合的歷史科學，把文化的發生發展作為一個總體對象加以研究；文化學則以文化現象、文化行為、文化本質、文化體系以及文化產生和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關於二者之區別，參考李榮善，《文化學引論》，頁 47-53；陳華文，《文化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頁 14-16。周積明先生亦曾從文化學理論、文化史、批評學三個面向，討論拓寬四庫學研究視野。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頁 15-20。

<sup>23</sup> 陳寅恪（1890-1969）先生曾說：「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



統文獻學，文獻文化學不企圖對文獻典籍進行過多品頭論足的批評，而是嘗試分析不同編纂方式所隱含的文化意義，或探討文化場域對其編纂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文獻文化學也不採取凌駕於古人的姿態，對古人作非理性的批判。任何批判都基於一定的主觀標準。以一種主觀否定另一種主觀，如此而欲「還原」歷史，無異於緣木求魚。因此，文獻文化學雖不排除批判性研究取向，但批判——毋寧說是反思，是詮釋之後的第二序研究目標。這對文獻文化學而言，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原則與態度。

## （二）被忽視的方法：文獻符碼的詮釋空間與文化學的觀照距離

或緣於上述雙向詮釋進徑之關係未予以充分釐清之故，四庫文化學及與之相關的文化學、文化史、批評學三個研究方向雖早已被提出，但在實際研究中，方法學的實踐卻似仍處於疏慵狀態。即使是目前用力較多的文化史研究方向，其方法似亦多止於相對簡單的文本分析與歸納。理論自覺，離不開方法學之自覺，而這也是四庫文化學值得深入省思的重點。方法學包含複雜的構成要素，從對研究對象所作的知識本質論的假定，到理論基礎的設定，再到問題的生成與解答之進路原則的設定，以及史料的處理運用等，具有複雜的系統。這恐怕非一單篇論文或筆者個人學力所能及。是以，本文只從文獻符碼與文化學理論這兩個相對較為被忽視的方面，拋出引玉之磚。

---

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陳寅恪，〈審查報告一〉，收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47年），頁1。

### 1. 文獻符碼：文獻文化學之獨特價值所在

在理論分析層面，文獻均可抽象地析出內容與形式兩個面向。但具體來說，內容與形式之關係又異常複雜，無法簡單地予以二分式處理。對文章創作者（writers）而言，就有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抽象性分別——此一層關係並非文獻文化學所能涉及。而創作者通過創作活動所完成的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統一體，對文獻編纂者（compilers）而言，便具有內容意義（meaning of content），可稱之為編纂內容（compilatory content）。換言之，就編纂活動來說，編纂內容是文獻通過特定的語言形式所直接呈現的思想觀念，而編纂形式（compilatory form）則是編纂內容的組織方式，包括分類、類題名、類排序等。

如此一來，前述所謂「文本意義」，除可通過編纂內容直接傳達，亦可通過編纂形式間接傳達。這是文本意義在「作者」（producer）與讀者之間實現傳輸的最起碼的兩個渠道。這裡所謂「作者」，其實便包含了創作者與編纂者這兩種可能性身份。創作者通常負責編纂內容的生產，是文獻內容意義的所有者；編纂者通常負責編纂形式的生產，是文獻形式意義（meaning of form）的所有者。儘管文獻的內容意義與形式意義在非理論性的實在層面是難以分解的——因為編纂者對任何文獻的處理，都須以對文獻內容意義進行內化理解作為先行條件，如此之後才能將其合乎慣例地轉化為編纂形式——然而，在抽象的理論分析上，無論文獻典籍之創作者與編纂者為同一主體，或非同一主體，其內容意義與形式意義亦可且宜予以分別觀察與討論。如《昭明文選》，其內容意義各歸屬於七百餘篇之創作者，而其形式意義則當歸屬於編纂者。於此，內容意義與形式意義，實歸屬不同思想體系。而當創作者與編纂者為同一主體時，如「四庫編纂組織」之於

《四庫全書總目》，<sup>24</sup> 內容意義與形式意義雖可歸屬同一思想體系，但因其意義傳輸媒介之不同，其各自所代表的意義系統又不必完全一致，亦可於相聯繫的基礎上分別審視，或相互印證。

不同文本，內容與形式之間的「意義容量」(capacity of meaning) 是不必相當的。如《四庫總目》與《漢書·藝文志》相比，它們形式的意義容量是相當的；但就內容的意義容量來說，則《漢書·藝文志》遠寡於《總目》，因為前者只有部類敘，而後者除部類敘外，所著錄、存目各書均另有提要。如此看來，當以如《漢書·藝文志》這種內容意義容量相對單薄的文本為研究對象時，通過形式去考察其文本意義便顯得異常重要。

理論上，所有古代典籍都屬於文獻文化學的研究對象。但區別於一般文化史，文獻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可能更偏向於那些形式意義尤為突出的文本，譬如書目、類書。即使是面對內容意義容量亦非常豐富的文本，如《四庫總目》，亦當特別注重（至少不應忽略）其編纂形式所具之文本意義，否則將造成形式意義遺失之憾。形式意義可以說是文獻文化學區別於一般研究方法的獨特價值所在。而傳統四庫文化學多倚重文本分析法，實將《總目》之提要內容當作普通史料看待，而忽略其編纂形式所蘊含的文本意義。然則，文本形式是否有足夠的文化詮釋空間？筆者對此抱持樂觀態度。這至少可從兩個面向努力：部次與題名。二者是文化場域賦予文獻以文本意義的重要符碼 (code)。<sup>25</sup>

<sup>24</sup> 《總目》的內容創作指提要的撰寫，形式編纂則指對各篇提要分類、排序等過程。無論是內容創作，還是形式編纂，都是由分纂官、總纂官與總裁官等館臣在清高宗（1711-1799）的指導性授意與有限性監督下實行的。館臣與清高宗實即形成一個具有多向互動性的整體的「編纂組織」。互動實即意味著矛盾的協調，至少涉及館臣間的多向互動，以及館臣與清高宗間的雙向互動。

<sup>25</sup> 「符碼」(code) 概念源自結構主義與符號學의 各種傳統，通常用來指稱規則和慣例。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符碼是一組揀選過的使用者群體的神秘領域」。這種「揀選」可能經由

所謂部次，涉及分類與類排序這兩項相互關聯的文獻符碼。文獻學家對圖書的部次，均有其文化場域之作用，甚至有直接的文化功用考量。如《四庫總目·子部總敘》對次序諸子之考量，即為顯證，其文曰：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之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之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sup>26</sup>

《四庫》之纂修，可能即有儒藏之考量，<sup>27</sup> 故尊尚儒家以居首。其後，以重武備次列兵家，為禁「寇賊姦宄」次列法家，重民本次列農家，又以維繫生死之故次列醫家，以重民事次列天文算法。可見「子部」前六家之次序，均基於經世實用的政治文化意圖。<sup>28</sup> 較於以往書目多

---

專業、區域或歷史傳統之差異來實現，通過揀選而構成一個對「外界」不完全開放的領域，這主要表現在符碼的象徵性與隱喻性上。因而需有「解碼」(decoded)的過程，將較不普遍的符碼轉譯為比較共通的符碼。[英]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臺北：巨流圖書，2003年)，頁52-54。文獻的部次與題名，即基於一定歷史傳統的規則或慣例；每當文獻學家決定創製「較不普遍的符碼」時，亦往往有其文化情境的考量。

<sup>26</sup> [清]永瑤、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91，頁1a-1b。

<sup>27</sup> 見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14；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頁2；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3-15。

<sup>28</sup> 相關討論亦可參考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頁35-41。

將農家、醫家置於子部末簡的做法，<sup>29</sup>《總目》如此「較不普遍的符碼」，實又有更多文化意義可資詮釋。此外，史部之確立，子史之易位，亦均為文獻符碼的文化詮釋功能之顯證。

作為四庫學文化研究之首倡者，楊家駱在呼籲關注《四庫全書》的文化體系與知識系統時，<sup>30</sup>其立論之重點實即基於《全書》之分類法。楊先生曰：

《四庫全書》意在保存以往原著的全文，而以其所認知識系統的分類法來部勒那些原著，使有秩序，以構成其所認為的知識整體。<sup>31</sup>

又曰：

《四庫全書》之所以能將三千四百七十種獨立的原著構成一個整體，其成因之一，是牠曾將這些原著銓配於一表示當時知識世界之分類法中，使之有序。易言之，上文所謂當時知識世界之分類法，就是《四庫全書》的知識體系。<sup>32</sup>

分類與類序組成的部次法則之中，已隱含了編纂者的知識體系及相關文化義涵。在傳統文化思維中，次序從來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文化意義，從而是重要的文化符碼，《周易·序卦傳》、《說文解字》始一終亥等文本，均可為顯證。因此，本文所謂「類序」也只能舉其一隅而

<sup>29</sup> 紀昀（1724-1805）曾曰：「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謂禮樂兵刑，國之大柄也。農家、醫家，舊史多退之於末簡，余獨以農家居四，而其五為醫家。農者，民命之所關。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故升諸他藝術上也。」〔清〕紀昀，〈濟眾新編序〉，《紀文達公遺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435，卷8，頁42a-42b。

<sup>30</sup> 首倡一說，見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頁58。

<sup>31</sup> 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上海：世界書局，1946年），頁壹-2。

<sup>32</sup> 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頁壹-13。

已。事實上，「類中之序」甚至文獻中任何次序，都可能隱含著特殊的文化信息。這當然需要更深入而具體的分析。

所謂題名，即指文獻學家編纂典籍時，為各部類所訂立的名稱。題名必須依循一定的符碼規則或慣例。唯有如此，使用者才能成功解碼，以循名考實。編纂者需要一套特定的「觀念系統」(system of thought) 來判斷題名副實與否。這套「觀念系統」是傳統觀念與新觀念的有機結合，也是有意識觀念 (conscious thought) 與無意識觀念 (unconscious thought) 的結合體。如經、史、子、集四部題名自《隋書·經籍志》確立後，即成後世四部分類書目之範式。這種整體意義下的「同質性」分類，與傳統中國以經為主而和合三部的學術整體觀念之逐漸確立有關。<sup>33</sup>

題名一旦名不副實，即會導致文獻符碼的文本意義之失落。每當意識及此，文獻學家便會設法對符碼進行修正，以使之副實。「集部」題名之逐漸確定，即是在文章學觀念的演變下，不斷修正題名符碼的結果。漢代以詩賦為文章，<sup>34</sup> 故《漢書·藝文志》以「詩賦略」名文集之略。後來隨著文體範疇之突破，文章觀念已非「詩賦」之名可以統攝，故王儉 (452-489)《七志》改為「文翰」，阮孝緒 (479-536) 又幾經斟酌，易作「文集」。故阮孝緒曰：

王 (儉) 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為「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為「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篇第四〉。<sup>35</sup>

<sup>33</sup> 四部分類的「同質性」觀點，參考楊晉龍，〈從「現代經濟理論」論《四庫全書總目》——經濟學及其相關概念與傳統中華文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26 卷第 1 期 (2008 年秋季)，頁 134。

<sup>34</sup> [清] 劉天惠，〈文筆考〉，見 [清] 阮福，〈《文筆考》〉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13-14。

<sup>35</sup> [南朝梁] 阮孝緒，〈七錄序〉，見 [唐] 釋道宣，〈《廣弘明集》〉，《四部叢刊初編》 (臺北：

即見文章觀念與文獻符碼之間的協調過程。四庫館臣對「五經總義」題名之確立，最見文獻學家於題名設立之審慎。《四庫總目·凡例》曰：

又兼詁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其為「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又不見其為「經解」。徐乾學《通志堂》所刻改名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經總義』。<sup>36</sup>

在《總目》看來，《唐志》之「經解」，《經義考》之「羣經」，均顧此失彼，不能副「兼詁羣經」之實。而《通志堂經解》之「總經解」雖取義周全，但又是杜撰，不符合文獻符碼之慣例。反覆斟酌，館臣最終決定依循《隋書·經籍志》確立「五經總義」之名。

以上諸例，足見部次與題名等文獻符碼對文化詮釋的重大意義。部分學者亦早已注意及此，如廖棟樑先生就曾比較《隋書·經籍志》、兩《唐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國史經籍志》與《四庫總目》等書目對《文心雕龍》與《詩品》的歸類情況，考察不同時期對文學批評認識的變化，即頗有創獲。<sup>37</sup> 筆者亦曾通過將《四庫總目》與歷代重要書目的部次進行對比，發現《總目》藉由對易學類圖書之部次，對易學思想進行全面肅清，將不符合儒家經典易學觀念的圖書宗、襍祥宗等流派，掃除出經部易類。此實即清代易學史上儒道分判潮流在目錄學上的反映，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擴大。<sup>38</sup> 但在四庫文化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縮印明刊本），冊477，卷3，頁37上。

<sup>36</sup> [清]永瑤、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3，頁3b。

<sup>37</sup> 廖棟樑，〈《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序》對文學批評的認識〉，《輔仁國文學報》第9期（1993年6月），頁125-126。

<sup>38</sup> 見蔡智力，〈不使異學淆正經：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易學圖書之部次看清代易學潮流〉，收入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77-194。

研究中，這種有意識的符碼詮釋方法似嫌偏少，而文獻符碼的文化詮釋功能，亦似未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

## 2. 文化學理論：回歸研究禁區的可能性取徑

緣於《四庫全書》的官方身分，學界對它的態度有幾度轉折。大抵乾嘉之時「不敢置一詞」，道咸以後則「信之者奉為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sup>39</sup> 至清朝敗亡後，隨著官方性格之消失，毀訾之論更為已甚。楊晉龍先生如此描述此一時期之四庫學研究現狀：

在光緒朝以後，一般中國人對於清朝的憤懣態度「從新發作」，學者處在當時那種「民族革命」的風潮下，受到這股「反滿」民族情緒的感染，比較無法自覺地以客觀冷靜的態度面對問題、發掘問題，《全書》和《總目》既是「欽定」，正是「反滿情緒」下必然的詬詈對象；且《全書》和《總目》又確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其中最容易入手，也最能引起共鳴的，自然就是攻擊它的「民族壓迫」，以及附帶的焚燬、刪改等不當的措施，……這大約是「四庫學」研究者在研究上呈現的弊病——統一的口徑：詈罵乾隆帝；同一的角度：糾繆補闕。<sup>40</sup>

他又指出：

長久以來「四庫學」的研究者大多用心在外圍相關問題的研究上，外圍的研究容易和外在的情境關聯，尤其是針對動機和影響，以及和這二者相關的刪奪、竄改等等問題，當在探究其形成問題的原因時，不免要去猜測或推斷乾隆帝個人政治措施、民族身分等相關的事情，這時候非學術的因素就容易被引入，

<sup>39</sup>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頁 48。

<sup>40</sup>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頁 364-365。



形成一種情緒，不免影響到判斷的客觀性，研究的態度及方向，也很可能被扭曲而出現一些偏差。<sup>41</sup>

楊先生對過往四庫學研究受非學術因素之影響作出深刻的揭示，認為他們多費心於「外圍問題」如動機和影響之類の研究上，一面猜度《全書》的編纂動機純粹是政治上的「寓禁於徵」，<sup>42</sup> 一面又在「反滿情緒」的煽動下片面攻擊《全書》的「民族壓迫」，從而忽視《全書》和《總目》「本身價值和意義」。<sup>43</sup> 經過再三致意，反覆呼籲，<sup>44</sup> 楊先生的苦心取得了相當成效。研究者開始逐漸關注《全書》本身，而政治動機之臆測與反滿情緒，亦相應減少。但若吹毛求疵以論之，則似又有過猶不及之虞，此即「外圍問題」關注之欠缺，以及對政治措施、民族身分諸問題的迴避。這似是對楊先生本意之誤解。以意逆志，楊先生當意在糾正受非學術因素影響的主觀性「憤懣態度」，至於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去審視《全書》編纂動機和影響等「外圍問題」，則未必為其所欲摒棄。如 1998 年於淡江大學舉辦之「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楊先生所發表的〈《四庫全書》訂正析論：原因與批判的探求〉一文，即從教化層面，析論清高宗編纂《全書》的動機與目的。<sup>45</sup>

從文獻文化學的角度看，尤其是在其中文化學進徑下，文獻之編纂沒有絕對的「外圍問題」。當將文獻置於文化場域進行審視，文獻

<sup>41</sup>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頁 380-381。

<sup>42</sup>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頁 376。

<sup>43</sup>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頁 380。

<sup>44</sup> 其後楊先生又在〈「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一文中，批評四庫學研究中的「『泛政治化』意識型態的表現」，並呼籲「瞭解的研究」。楊晉龍，〈「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研究時的幾個問題〉，頁 25、58。

<sup>45</sup> 楊晉龍，〈《四庫全書》訂正析論：原因與批判的探求〉，收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37-374。從某種層面講，教化也是政治行為。

的文本意義便無法超脫場域中由政治、民族、思想、經濟等制約因素交織、滲透、混融而成的「總體存在情境」而獨立自在，獨具意義。<sup>46</sup>「總體情境」中任何制約因素，都可能影響文獻學家的編纂行為，從而改變文獻的文本意義。反而觀之，文獻的文本意義亦唯有置於「總體情境」中，才有可能被深刻理解與合理解釋。具體到《四庫全書》，則政治意識形態與民族意識，更是其「總體情境」中至為重要的制約因素，從而無法迴避。然則，問題即在於：如何相對客觀而理性地直面這些無法迴避的「外圍問題」？文化學方法論相對冷峻的研究態度，或許值得借鑑。周積明先生雖早已呼籲於四庫學研究中引入文化學理論，但切實的響應則似鮮見。以筆者之淺見，文化學至少有如下論域為四庫文化學可嘗試者。

(1) 民族關係分析：民族問題是四庫學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稍不注意便會不自覺地激起「反滿情緒」。因而，針對此問題相對深入的學術性研究，似不多見。然而，就《全書》之編纂與其文本之呈現而言，民族問題是相當豐富且複雜的。借鑑西方殖民理論簡要分析，<sup>47</sup> 則從政治角度看，滿族是殖民主 (the colonizer)，而漢族則是

<sup>46</sup> 「總體情境」是顏崑陽先生文學批評理論的重要概念，蓋借鏡於亞伯拉姆斯 (M. H. Abrams, 1912-2015) 在《鏡與燈》中所陳述的文學四大要素理論，認為「文學總體情境」即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讀者。見顏崑陽，〈《文心雕龍》二重「興」義及其在「興」觀念史的轉型位置〉，《詩比興系論》(臺北：聯經出版，2017年)，頁212。顏先生認為：「諸多『文化世界』的構成要素，包括過去的精神傳統，以及當代之倫理、政治、宗教、經濟、文學、藝術等各種社會流業活動，雖然可以在抽象概念的認知中，做出切分的界說；但是，在生活的實踐中，卻是各要素彼此滲透、各部件交互作用而『混融』為動態歷程性結構的『總體存在情境』；文學乃是混融在這『總體存在情境』中的要素或部件之一，而文學家也就身處此一『世界』所現的存在情境中。」顏崑陽，〈「文學自覺說」與「文學獨立說」之批判芻論〉，收入慶祝黃錦鉉教授九秩嵩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慶祝黃錦鉉教授九秩嵩壽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2011年)，頁931。於文獻文本，蓋亦同理。

<sup>47</sup> 殖民主義是學者對歐洲壓迫其他世界的殖民經歷之界定，其中諸多具體內容並不能完全適用於清代滿漢關係。但作為由不同種族構成的社會羣體在相互遭遇後所產生的支配關係及行為模式，則對滿漢關係的研究，當亦有相通之處可資借鑑。關於殖民主義的義涵，參考

被殖民者 (the colonized); 但在文化上則恰好相反, 乃漢族為殖民主, 而滿族為被殖民者。如此弔詭的身分錯置, 對以清高宗為首的「編纂組織」的編纂心理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種影響又如何延伸到編纂與評價行為上? 作為政治上的殖民主, 清高宗通過怎樣的策略, 將被殖民者的歷史記憶予以根除?<sup>48</sup> 而作為文化上的被殖民者, 清高宗又怎樣面對滿洲貴族對清語的「失憶」,<sup>49</sup> 以及漢族典籍對少數族裔歧視性論述的問題?<sup>50</sup> 而漢族知識分子在面對清高宗的政治殖民行為以及在文化上「脫離殖民」(decolonization) 的企圖, 又是如何應對的? 如上諸題, 都是難解卻又饒有趣味與意義的。

(2) 權力論述: 據瑪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的定義, 權力是指「行動者在一個社會關係中, 可以排除抗拒以貫徹其意

---

廖炳惠,《關鍵詞 200: 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 麥田出版, 2003 年), 頁 42-45。

<sup>48</sup> 後殖民學者梅彌 (Albert Memmi) 認為殖民所造成的最重要傷害, 是使被殖民者從他的歷史和社羣中被徹底根除, 並使其對自己的生活方式、記憶與語言, 產生遺忘與憎恨的情緒, 從而形成一種殖民主與被殖民者之間優/劣、上/下的二元辯證關係。見廖炳惠,《關鍵詞 200: 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 頁 43。梅彌所描述的殖民關係, 對分析滿漢關係有什麼啟發? 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sup>49</sup> 滿人入關後漢化程度極深, 很多滿洲貴族的清語都日漸生疏, 而這種轉變在乾隆年間尤為顯著。可參考吳哲夫,〈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故宮學術季刊》第 12 卷第 2 期 (1994 年冬季), 頁 10; 楊亞庚、王小影,〈以《清實錄》為依據看清朝中期滿語文的衰微〉,《長春師範學院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 頁 80-83。語言的遺忘正是被殖民者重要的表徵。

<sup>50</sup> 傳統中國的民族觀鄙夷外族, 故對外族之指稱多為帶「犭」旁的鄙稱。從文化學角度講, 這就是一種知識/權力的論述策略。「論述」(discourse) 是傅柯學說中的核心概念, 對他而言「論述」是一種陳述的系統, 藉由這種方式可以形成主客體間的權力關係, 甚至在不知不覺中讓主體變成客體。見廖炳惠,《關鍵詞 200: 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 頁 50、82-85。清高宗修《四庫全書》, 即對古代典籍中此類文字作大規模刪改, 當然亦有為數不少的漏網之魚。相關討論參見吳哲夫,〈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故宮學術季刊》第 9 卷第 3 期 (1992 年春季), 頁 10-12、15-16。

志的機會，而不論這種機會的基礎是什麼」。<sup>51</sup> 在《四庫全書》的「編纂組織」中，政治權力的作用是顯著的。此外其實仍有知識權力的作用，乃似相對為學者所忽視者。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理論，便挖掘了「知識」與「權力」的合謀關係。他認為，論述就是權力，人類只能屈服於知識的論述權力下，對知識權力的運作體系毫無抗拒能力。<sup>52</sup> 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之間的角逐，事實上一直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史的重要主題，此蓋即余英時先生所謂「道」與「勢」之間的緊張關係。<sup>53</sup> 而在乾嘉時期，傳統文化雖已是強弩之末，「道」在「勢」的較轆下日見羸弱，早已不復見「從道不從君」之骨力。但「道」與「勢」之緊張，其實並沒有完全消除，只是由先秦的「明爭」，轉為後來的「暗鬥」。清高宗居至尊之「勢」，但又以知識分子自期，<sup>54</sup> 這本質上就是對知識權力的馴服。因此，在「四庫編纂組織」中，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的角力是依然存在的。黃瓊誼揭示《四庫總目》對清高宗旨意之違逆，其實即這兩種權力相互角力之明證。<sup>55</sup> 而二者之間的角力，便直接而深刻地影響編纂行為與評價行為的取向，是理解《全書》文本意義的關鍵。

理論上說，四庫學沒有不可涉足的問題禁區，只有不當的研究態度。而文化學理論的真正引入，一方面，其冷峻的分析態度，可對治

<sup>51</sup> 〔德〕瑪克斯·韋伯著，顧忠華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臺北：遠流出版，2016年），頁91。

<sup>52</sup> 參考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obert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 53; 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148。

<sup>53</sup> 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1980年），頁40-41。

<sup>54</sup> 吳哲夫與楊晉龍都注意到清高宗同時作為知識分子的身分特徵，分見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256；楊晉龍，〈《四庫全書》訂正析論：原因與批判的探求〉，頁341。

<sup>55</sup> 黃瓊誼，〈《四庫全書總目》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以集部為考察中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121期（2011年10月），頁26-51。

傳統四庫學不當的「憤懣態度」；另一方面，其縝密的理論思考亦可開拓四庫文化學的研究視域，甚至可以直接借鑑。當然，無論是四庫文化學還是文獻文化學，都應建基於傳統文化特有的總體情境，不宜生硬套用西方理論。這需要對其理論進行顏崑陽先生所謂的「內造建構」的努力，<sup>56</sup> 須集所有四庫學研究者之智慧，而非筆者學力所能及。

然則，在文獻文化學如此理論架構觀照下，四庫文化學的研究現狀如何？未來又有哪些可能性的拓展進徑？

### 三、累積與轉向：四庫文化學研究現狀與趨勢之省思

早期四庫學多沿襲刊誤、補正、考核、糾謬的樸學路數，<sup>57</sup> 至吳哲夫、周積明、楊晉龍始另闢四庫學文化研究之蹊徑。吳哲夫先生撰《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時，即頗關注《全書》對傳統文化之傳承與擴充。<sup>58</sup> 後又撰〈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諸文，對《全書》所具之文化特徵，多所揭示。而周積明先生《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呼籲關注《全書》的文化品性與文化價值，並著實從經世價值觀念、理學批評、學術論諸方面進行深入分析，創獲甚夥，基本奠定四庫文化學的研究

<sup>56</sup> 顏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談及「內造建構」的概念，其大旨在於反對中文學界照搬西方理論的做法，而強調回歸中國文學的內部，以洞觀其內在所隱含的某種秩序性的結構與歷程性的規律，並進行意義的詮釋與系統的建構，以此作為再應用的知識基礎。參見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淡江中文學報》第18期（2008年6月），頁287；顏崑陽，〈從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論「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叢聚狀結構〉，《東華漢學》第9期（2009年6月），頁20；顏崑陽，〈從應感、喻志、緣情、玄思、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詩比興系論》，頁332。

<sup>57</sup> 周積明，〈「四庫學」：歷史與思考〉，頁58。

<sup>58</sup>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255-275。

範式。<sup>59</sup> 楊晉龍先生〈「四庫學」研究的反思〉、〈「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諸文，亦對傳統四庫學多所反思，並呼籲改變研究方式，直接從文本著手以突顯《全書》的意義與價值。此後，四庫文化學研究蔚然成風，與其他研究路數形成鼎立之勢。<sup>60</sup> 以下分兩個面向概述其現狀與趨勢。

### （一）文化史研究的廣度累積

四庫學文化史研究，即指透過《全書》及相關文獻，考察其文化內涵或價值意義，甚或藉此進一步探討其背後的時代文化特徵。文化史研究是四庫文化學目前成果最豐碩的一路。根據研究對象之層次，可分為學術史與思想史兩個範疇。<sup>61</sup>

<sup>59</sup> 周著初版 1991 年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 年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

<sup>60</sup> 程惠新、陳東輝，〈2000-2014 年《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綜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6 年第 3 期，頁 70。

<sup>61</sup> 學術史與思想史範疇之差異，不少學者都已論及。張立文先生即認為，思想史指人對宇宙（可能世界）、社會（生存世界）、人生（意義世界）的事件、生活、行為的所思所想，以描述和解釋的形式歷史地呈現出來的歷程；而學術史則直面已有的哲學家、思想家、學問家、科學家、宗教家、文學家、史學家、經學家等的學說和方法系統，並藉其文本和成果，通過考鏡源流、分源別派，歷史地呈現其學術延續的血脈和趨勢。張立文，〈中國學術的界說、演替和創新——兼論中國學術史與思想史、哲學史的分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 年第 1 期，頁 2-3。思想史直接面對宇宙、世界、人生，是第一序之研究；而學術史乃針對既有之學說、方法之歷史，是第二序之研究。學術史與思想史之界限有時又並非理論上那麼清晰，甚至有重疊的部分，但亦宜予以區別。然而實際研究中，不少學者卻似有混淆之嫌，往往「學術思想」連言而實指其一偏，甚至睿智如梁任公（1873-1929）、錢賓四（1895-1990）二先生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被指冠以「學術史」之名而「更多地還是要歸於思想史一類」。見劉曙光，〈學術史與思想史關係的討論及其反思〉，《雲夢學刊》2006 年第 4 期，頁 9。

## 1. 學術史

在四庫文化學文化史研究的兩個範疇中，學術史之研究又佔其絕大多數，<sup>62</sup> 而明代研究、詞曲觀念、小說觀念、諸經觀念、王士禎（1634-1711）研究、漢宋爭議等，則是最為聚焦的幾個議題。

在筆者蒐集的論著中，有四十多篇（部）明確以明代為研究對象，居歷代之首。<sup>63</sup> 明代研究之所以集中，與「四庫編纂組織」對待明代歷史之公正性受到質疑有關。首先，明清鼎革，且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通過《四庫》之纂修「重塑歷史」，並藉以展開政權正當性之論述；再者，知識分子反思明代之滅亡，亦難免要以明代學術作為亡國的「代罪羔羊」。<sup>64</sup> 政治權力與學術權力「合謀」，從而造就了異於現代觀念的可疑的「明代書寫」，其之吸引學者好奇亦不足為怪。

以詞曲和小說作為研究對象者，在筆者所搜羅的論著中，亦均超過二十篇（部）。總體而言，同題之作並不少見，而小說類亦不乏佳構。詞曲方面，直接以詞學觀為題者，即有孫紀文、劉貴華、馮淑然、王騰飛等；<sup>65</sup> 而直接以詞曲觀為題者，則有盧盈君、柳燕、徐朋雲

<sup>62</sup> 筆者根據所掌握之論著資料予以力求嚴謹的分類，其中有 247 篇（部）可歸為文化史研究範疇，而當中屬於學術史範疇者則有 196 篇（部）之多，佔總數之 79.3%。

<sup>63</sup> 其中值得注意者，有如何宗美、劉敬之《明代文學還原研究》，對明代重要作家與流派在《總目》中的論述，作了深入而詳實的考辨與批評。唯其欲「重新審視二百多年前清人在專制的封建政治和狹隘的民族制度環境下的明代文學批評」，並「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糾正前人的偏見和錯誤」諸態度，則似有凌駕古人之嫌。何宗美、劉敬，〈前言〉，《明代文學還原研究——以《四庫總目》明人別集提要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4。另外楊晉龍，〈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評價析論其評價內涵的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6期（2000年3月），頁523-586；曾令愉，〈《四庫全書總目》「公論」視野下的明代詩文〉（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邵毅平，〈評《四庫全書總目》的晚明文風觀〉，《復旦學報》1990年第3期，頁52-57等亦篤實而有創見。

<sup>64</sup> 楊晉龍，〈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評價析論其評價內涵的意義〉，頁526。

<sup>65</sup> 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詞籍批評〉，《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6年第6期，頁161-164；劉貴華，〈論《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詞學思想〉，《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頁62-64；馮淑然、艾洪濤，〈論《四庫全書總目》的詞體美學觀〉，《河北大學學

等。<sup>66</sup> 多標題稍異，論見亦多所因循。當然，亦不乏別具創見者。如李劍亮在詞曲學史的座標系中，檢討《總目》在詞學史中之地位；<sup>67</sup> 徐燕琳則從歸類、界義的角度，析論《總目》之戲曲本體論、特徵論等問題，亦頗有獨見。<sup>68</sup> 小說方面，雖然同題之作亦為數不少，<sup>69</sup> 亦有不少研究能獨闢蹊徑。如趙振祥從乾嘉史學考據風氣觀察《總目》小說「脫史入子」的本質，<sup>70</sup> 宋世瑞、劉遠鑫從《總目》「說部」與「小說」並存之狀態析論多種小說觀念之矛盾衝突，<sup>71</sup> 袁文春論證《總目》如何巧妙地使小說之虛構合法化，<sup>72</sup> 以及鍾志偉對《總目》

---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頁118-123；王騰飛、鄧喬彬，〈四庫館臣之詞學觀〉，《詞學》2010年第2期，頁154-168。

<sup>66</sup> 盧盈君，〈《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8年）；柳燕、彭芸芸，〈《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念探析〉，《歷史文獻研究》2014年第1期，頁346-353；徐朋雲，〈《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述要〉，《安徽文學》2010年第8期，頁78。

<sup>67</sup> 李劍亮，〈試論《四庫全書總目》詞籍提要的詞學批評成就〉，《文學遺產》2001年第5期，頁86-93。

<sup>68</sup> 徐燕琳，〈論《四庫全書總目》的戲曲文體批評〉，《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頁23-31。

<sup>69</sup> 如李飛，〈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透射出的小說理念〉，《北方文學》2010年第8期，頁88-89；韓春平，〈《四庫全書總目》的小說觀及其原因探析〉，《貴州文史叢刊》2007年第1期，頁83-87；張泓，〈實學思潮與《四庫全書總目》的小說觀〉，《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68-73；翁筱曼，〈「小說」的目錄學定位——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小說觀為視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80-84；凌碩為，〈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小說觀〉，《江淮論壇》2004年第4期，頁114-117；溫慶新，〈試論政教視域下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觀念〉，《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5年第10期，頁71-74、83；季野，〈開明的迂腐與困惑的固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觀的現代觀照〉，《小說評論》1997年第4期，頁69-73。

<sup>70</sup> 趙振祥，〈從《四庫全書》小說著錄情況看乾嘉史學對清代小說目錄學的影響〉，《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1期，頁141-148。

<sup>71</sup> 宋世瑞、劉遠鑫，〈「說部」與「小說」：《四庫全書總目》之小說異名狀態辨〉，《文藝評論》2016年第10期，頁56-63。

<sup>72</sup> 袁文春，〈小說價值標準的調整與虛構的合法化——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頁39-43。



「假傳體」小說之研究等等，<sup>73</sup> 皆極有意義之探討。詞曲與小說作為兩種文類而聚集相當數量的研究關注，其主要原因當緣於古今文學觀念之差異。詞曲「體卑而藝賤」，<sup>74</sup> 小說「出於稗官」，皆非《總目》之所貴重。而「五四」以降，隨著新知識型的形成，學術界提舉別異於傳統的以「純粹審美」為基準的「純文學」。<sup>75</sup> 詞曲、小說便成為這種「純文學」之典範，而它們在《總目》中卑賤的地位，便尤顯彆扭。這大概是學者不約而同意欲一探究竟的重要原因。

此外，經學觀念亦為學者探求之重點，其中又相對集中於《詩》類與《春秋》類。<sup>76</sup> 而王士禎以一個人的影響力，亦聚焦了至少十篇文章對他作專門研究。<sup>77</sup> 從錯位研究的角度考量，上述主題多已相對

<sup>73</sup> 鍾志偉，〈平議《四庫全書總目》「假傳體」文類的編目與批評〉，《漢學研究》第32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259-292。

<sup>74</sup> 〔清〕永瑤、紀昀等，〈別集類案語〉，《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73，頁54b-55a。

<sup>75</sup> 顏崑陽，〈「文學自覺說」與「文學獨立說」之批判芻論〉，頁917-930。

<sup>76</sup> 前者有如楊晉龍，〈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詩經學的評價〉，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頁441-477；鄒然，〈《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學著作評論述要〉，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111-131；何海燕，〈從《四庫全書總目》看清初《詩經》研究之狀況——兼談《總目》治《詩》思想對清中後期《詩經》研究的影響〉，《湖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頁342-345等等。後者除吳哲夫先生〈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外，尚有江毓奇，〈《四庫全書總目》之「春秋」學譜系「蘊涵」的思維方式〉，《淡江中文學報》第26期（2012年6月），頁197-220；林穎政，〈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春秋學的評價標準〉，《經學研究集刊》第10期（2011年4月），頁121-152；汪惠敏，〈《四庫全書提要》對宋儒春秋學評騭之態度〉，《書目季刊》第22卷第3期（1988年12月），頁71-77等等。

<sup>77</sup> 如楊晉龍，〈王士禎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地位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7期（1993年5月），頁1-31；曾守正，〈所見與不見——《四庫全書總目》視野下的《漁洋詩話》〉，收入賴貴三主編，《中孚大有集：黃慶萱教授八秩壽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515-536；陳美朱，〈析論紀昀對王士禎之詩學與結納標榜的批評〉，《東華人文學報》第8期（2006年1月），頁123-148；張傳峰，〈《四庫全書總目》詩學批評與王漁洋詩學〉，《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頁49-53；何宗美，〈《四庫全書總目》王士禎批評外誤辨證——兼析館臣提要撰寫體例及主觀缺失〉，《文學遺產》2015年第6期，

飽和。學者有志其間，亦宜採取新視角、新方法，始能避免重覆研究或同題之作。而漢宋之爭雖亦為前賢多所關注的論題，<sup>78</sup> 但由於其本身的複雜性及對於理解乾嘉之時代情境和《總目》之文本情境的重要性，應尚有相當的討論空間。

## 2. 思想史

據張立文先生對思想史的界義，學者從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四庫學，似相對較少，而且其中不少似已糅合於學術史一同討論，如許嘉瑋在「崇實」思想下討論「楚辭類」，<sup>79</sup> 劉德明從「根柢」思想的角度討論經學對文學的影響，<sup>80</sup> 曾守正、龔詩堯、曾令愉在「公論」視野下討論文學批評。<sup>81</sup> 他們的共同特徵是，認為《總目》在梳理學術源流的同時，似乎還有另外一個雖是相輔相成，卻又相對獨立而可抽象討論的觀念，與其並行。

---

頁 171-182。而門庭更是一人獨作五篇，如門庭，〈《四庫全書總目》與王漁洋詩學——兼論四庫館臣詩學觀〉，《圖書館學刊》2009 年第 4 期，頁 88-90 等等。

<sup>78</sup> 如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1995 年），冊 22，頁 581-588；周積明，〈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清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1-18；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2005 年冬季），頁 83-128；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收入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頁 141-170。

<sup>79</sup> 許嘉瑋，〈「崇實」作為一種批評方法——論《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提要呈現之文學思想〉，《淡江中文學報》第 27 期（2012 年 12 月），頁 225-252。

<sup>80</sup> 劉德明，〈《四庫全書總目》的「根柢」觀探究——經學視野下的文學觀〉，收入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第六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2006 年），頁 543-567。

<sup>81</sup> 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宋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輔仁國文學報》第 23 期（2007 年 2 月），頁 73-101；龔詩堯，〈《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年），頁 65-90；曾令愉，〈《四庫全書總目》「公論」視野下的明代詩文〉，頁 70-107。

「崇實」是四庫文化學中被討論得最充分的思想範疇。單以《總目》為例，「崇實」思想即牽涉極廣。學術上，經史子集四部均在其籠罩下論述，重考據，求徵實；而在為人上，亦講求經世實用。早在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第一章即以「以實心勵實行，以實行勵實用」為題，深入討論其經世價值觀。<sup>82</sup> 曾紀剛亦以經史二部為限，討論《總目》及清初的崇實思潮。<sup>83</sup> 前述劉德明討論「根柢」，以及許嘉璋一文，均屬此範疇下的研究。

另一個相對突出的主題是「西學觀」，吳哲夫、周積明對此曾分別從收錄原則和思想觀念的角度，進行過深入討論。<sup>84</sup> 龐乃明將論域置換為「歐洲觀」，亦作出相關討論。<sup>85</sup> 此外，計文德更有專書予以研究。<sup>86</sup> 可見此論題亦已有相當充分的討論。

但總體而言，就四庫文化學研究對象之層次而言，思想史的研究遠不及學術史之充分且深入。這一定程度上與研究方法過於依賴傳統的文本分析法有關。一方面，《總目》作為四庫文化學研究之重鎮，同時亦作為文本分析法施用的對象，其提要直接討論的對象多是各種圖書，及與圖書直接相關的學術問題。另一方面，過往研究者對《總目》價值意義之認識，可能亦更多止於余嘉錫所謂的「辨章學術」。<sup>87</sup> 然而，在《總目》辨章學術的「表層論述」之下，是否仍隱含著一些不直接論述卻著實存在的思想？這種思想可能有某些線索（如關鍵

<sup>82</sup> 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頁 21-49。

<sup>83</sup> 曾紀剛，《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以經史二部為主的觀察》（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sup>84</sup> 吳哲夫，〈四庫全書的歐西文明曙光〉，《中文學報》第 11 期（2004 年 12 月），頁 35-46；周積明，〈析《四庫全書總目》的西學觀〉，《中州學刊》1992 年第 3 期，頁 112-116。

<sup>85</sup> 龐乃明，〈從四庫提要看清人歐洲觀〉，《明清論叢》2014 年第 13 輯，頁 195-205。

<sup>86</sup> 計文德，《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臺北：漢美圖書，1991 年）。

<sup>87</sup> 余先生曾讚譽《總目》曰：「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高挹羣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頁 48。

詞)，浮於語言表層，方便尋繹，如「徵實」、「公論」即往往作為《總目》辨章學術之關鍵詞或先驗理據；亦可能是完全隱沒於語言表層之下的「深層論述」，鮮有蹤跡可循——這或許即是阿蘭·梅吉爾（Allan Megill）所謂的「無關聯性觀念」（inarticulate ideas）或「未思之物」（the unthought）。<sup>88</sup> 或職此故，四庫文化學在學術史之廣度研究上已經取得豐碩成果，而隱藏於文本「表層論述」之下的「深層論述」中的思想史部分，則較少被觸及。如此一來，距離周積明先生多年前所呼籲的，捕獲滲透於《總目》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思維方式、民族價值取向以及獨特的時代個性」，<sup>89</sup> 似乎仍有相當路程。

要在思想史研究上取得突破，一方面需要更深入而細緻的文本分析，使分析的觸角抵達語言表層下的「深層論述」。另一方面，文獻符碼的詮釋功能，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因為無論是部次抑或題名，多是「無關聯性觀念」的間接表述，但其體例之建立則往往是文獻學家深思熟慮的行為結果。因此，文獻符碼之中，當有豐富的「無關聯性觀念」可資發掘。而與部次、題名等文獻符碼法相應，四庫文化學至少在範疇史之研究上，應當尚有發揮空間。

## （二）B 進徑的悄然轉向

新世紀以前，四庫文化學基本上依循著文化史進徑，透過《四庫》觀察時代文化。進入新世紀後，研究進徑出現了轉向的跡象，部分學

---

<sup>88</sup> 阿蘭·梅吉爾在分辨觀念史與思想史之區別時，用「有關聯性觀念」（articulate ideas）指稱觀念史，而以「無關聯性觀念」或「未思之物」指稱思想史。在他看來，所謂思想史（未思之物）即「包括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想法和人們可能從未實際思考過的想法，但這些想法卻對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和如何在這個世界中行動產生了巨大影響」。（美）阿蘭·梅吉爾、張旭鵬，〈什麼是觀念史？——對話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阿蘭·梅吉爾教授〉，《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2期，頁108-119。

<sup>89</sup>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頁16。

者開始嘗試透過時代文化，反向觀察《四庫》。

周積明先生 2000 年發表的〈《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一定程度上預示著研究進徑之轉向；論文從文化整體之成熟，以及時代的實證風氣、理學霸權之消解和西學之有限吸納諸面向，試圖重建當時總體文化情境，並藉此解釋《四庫》之誕生。<sup>90</sup> 與周先生相似，姜海軍則在南北學術分立的歷史情境中觀察《四庫全書》之編纂，認為乾隆朝代表官方意識形態的理學固化，與江南考據之學日益分立，而清高宗在此情境下敕命編纂《全書》，便有整合朝／野、南／北差異，重新樹立中央學術權威的意味。<sup>91</sup> 而劉美玲以知識權力的理論視角，在還原清代婦女社會地位的基礎上，通過對比歷代書目中女性著作之著錄，審視《總目》對女性知識典籍之著錄情況，揭櫫《總目》通過對女性著作的歸類，對她們施以某種程度的知識權威，亦是頗有意義的探討。<sup>92</sup> 許崇德從政治與學術互動的角度，析論清高宗出於政治需要，藉漢學家攻擊宋學家門戶結黨之習，而漢學家則出於學術需要，欲藉攻擊宋學以還原經典，政治與學術匯流而形成超然漢宋之上的「新門戶」，並藉此以解釋《總目》在重漢輕宋之中又有調和漢宋之傾向等問題，亦極有創獲。<sup>93</sup> 此外，曾守正先生《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雖以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為討論重點，但亦往往從權力論述或新歷史主義諸角度，對《總目》思想作出深刻解釋。<sup>94</sup>

<sup>90</sup>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社會科學戰線》2000 年第 3 期，頁 104-113。

<sup>91</sup> 姜海軍，〈清中期南北學術的分立、一統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史學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頁 18-26。

<sup>92</sup> 劉美玲，〈《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有關女性著作的探討〉，《書目季刊》第 37 卷第 2 期（2003 年 9 月），頁 13-30。

<sup>93</sup> 許崇德，〈論政治與經學流向對《四庫全書總目》評騭標準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第 24 卷第 3 期（2007 年春季），頁 95-140。

<sup>94</sup>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頁 32-42。

以上諸先生之論著，都不同程度轉向文獻文化學所謂的「B 進徑」，即透過文化場域觀察文獻編纂行為。此一轉向並非只是研究進徑之轉向，亦可能預示著四庫學分類結構的再調整。按周積明先生的四分法或三分法，上述研究就性質而言，其實至少已經融合了「四庫歷史學」和「四庫文化學」兩個層面。當文獻文本被歸置於歷史文化情境時，文本意義與歷史之界線其實已經模糊化。曾守正先生是文獻考據取向和文獻詮釋取向的二分法，他也指出兩種取向的研究在近年有「合流的狀況」。<sup>95</sup> 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聲稱「打破了《四庫全書》、乾嘉學術與政治各自為政的研究局面」，<sup>96</sup> 也正顯示了此研究趨勢之所向，不管她是否確實做到這點。

本節標題只稱「B 進徑」，而不直稱「文化學進徑」，乃出於對文化學理論或研究方法的期待。較之四庫學其他研究路數，「B 進徑」研究的理論自覺已經相當突出，如劉美玲、曾守正等人都不同程度嘗試了權力論述理論。但欲使四庫文化學成其為「文化學」，其文化學理論的實踐，似仍有待更進一步。楊晉龍先生十年前即呼籲，將現代學術理論應用於《總目》的研究，藉以重新闡釋其現代學術意義下的價值，並親自以經濟學的「長尾理論」等對《總目》進行了新的解釋，亦屬有意義的方法學試驗。<sup>97</sup> 文化學理論的深入實踐，正是四庫文化學順沿「B 進徑」的轉向，在未來仍可有突破的可能性空間。當然，理論之自覺，借鏡乃不得已，根據自身文化特色進行「內造建構」才是長遠之計。

正如曾守正先生指出的，近年分纂稿、各種稿本以及各閣書前提

<sup>95</sup> 曾守正，〈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集部國朝〈提要〉〉，《淡江中文學報》第 31 期（2014 年 12 月），頁 174-175。

<sup>96</sup> 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30。

<sup>97</sup> 楊晉龍，〈從「現代經濟理論」論《四庫全書總目》——經濟學及其相關概念與傳統中華文化研究〉，頁 149-150。

要的整理出版，「使得官方意見的凝結過程與特色更為明晰」。<sup>98</sup> 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官方意見的凝結」無異於編纂行為的「凝結」，這對編纂行為的顯題化無疑有巨大的助益，從而擴大了文化學的詮釋空間。此亦「B 進徑」推進至「文化學進徑」的有利因素。

#### 四、結語

本文為在文獻文化學的總體觀照下，對四庫文化學再作理論省思，首先即探討了文獻文化學的可能性。文獻文化學的基本假定是，文化場域對處於其中的文獻文本具有制約性或決定性作用；文獻所呈現的文本意義，以及文獻學家所作出的編纂行為，都是文化場域中各種制約因素交互作用的投射。因此，當將文獻文本歸置於其原本所處的文化場域進行觀察時，便會產生可雙向詮釋的問題進徑：A、透過文獻是否可以追溯其所處場域的文化樣態？B、在文化場域中，各種文化因素如何制約文獻的編纂行為？A 進徑透過文獻觀察文化，是文化史的研究方法；B 進徑透過文化場域觀察文獻，是文化學的研究方法。藉由此兩個進徑，本文對文獻文化學與四庫文化學的理論方法予以省思。一方面，傳統四庫文化學相對偏重於文本分析方法，即著重於發掘文本的內容意義，而對以文獻符碼（如部次與題名等）為代表的形式意義的發掘，則相對忽略。而事實證明，文獻的部次與題名等符碼，其文本意義亦相當豐富。另一方面，由於《四庫》曖昧的官方身分，傳統四庫學處理政治或民族等「外圍問題」時，非「泛政治化」地斥責，即迴避而不深究。然而，既已假定文化場域對文獻具有制約性甚至決定性作用，那麼文獻文化學便不可能忽略任何「外圍問題」。

<sup>98</sup> 曾守正，〈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集部國朝〈提要〉〉，頁 175。

因此，如果能適當引入文化學理論，如殖民理論、權力論述等，以其冷峻的分析態度對治傳統四庫學憤懣的非學術性態度，對四庫文化學之發展無疑是極為重要的。

以文獻文化學的理論構想為基礎，本文對四庫文化學之研究現狀與趨勢再作省思。分析認為，四庫文化學目前較偏重於文化史研究，其中又以學術史研究為重中之重。此中，明代研究、詞曲觀念、小說觀念、諸經觀念、王士禎研究、漢宋爭議等，又是最為聚焦的議題。其中詞曲、小說觀念研究，出現為數不少的同題之作，一定程度表示這些論題已被充分討論，甚至就目前的方法視域來看已是趨於飽和，須採取新視角、新方法始能有新突破。與學術史相對的作為第一序的思想史研究，其所受到的關注則相對較少，據目前觀察只相對集中於「崇實」與「西學觀」等少數幾個範疇。究其原因，一方面《總目》作為四庫文化學研究之重鎮，同時又是文本分析施用的對象，其直接的討論對象即多在於學術；另一方面，過往研究者對《總目》價值意義之認識，亦多限於余嘉錫所謂的「辨章學術」，而忽視辨章學術「表層論述」下的深層思想。欲於此有所突破，更深入的文本分析與文獻符碼詮釋法，或許都可以嘗試。此外，進入新世紀後，四庫文化學出現了由傳統文化史進徑轉向「B 進徑」的趨勢，即透過文化場域逆向觀察《四庫》。但由於文化學理論的自覺應用仍有所欠缺，故此一轉向實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責任校對：李瑞竹）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縮印明刊本，冊477。
-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清〕永瑢、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435。
- 〔清〕阮福，《文筆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二、近人論著

- 王騰飛、鄧喬彬，〈四庫館臣之詞學觀〉，《詞學》2010年第2期，頁154-168。
- 石玉，〈文本解讀——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讀後〉，《江漢論壇》1992年第10期，頁81。
- 朱仁天，〈「四庫學」，還是「四庫總目學」？〉，收入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主辦，「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會議」會議論文，湖南：2016年6月5-6日，頁236-241。
- 江毓奇，〈《四庫全書總目》之「《春秋》學譜系」蘊涵的思維方式〉，《淡江中文學報》第26期，2012年6月，頁197-220。
- 何宗美，〈《四庫全書總目》王士禎批評舛誤辨證——兼析館臣提要撰寫體例及主觀缺失〉，《文學遺產》2015年第6期，頁171-182。
- \_\_\_\_\_，〈四庫學建構的思考〉，《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172-181。

- 何宗美、劉敬，《明代文學還原研究——以《四庫總目》明人別集提要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 何海燕，〈從《四庫全書總目》看清初《詩經》研究之狀況——兼談《總目》治《詩》思想對清中後期《詩經》研究的影響〉，《湖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頁342-345。
- 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1980年，頁1-92。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年。
- \_\_\_\_\_，〈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圖書著錄之評議〉，《故宮學術季刊》第9卷第3期，1992年春季，頁1-18。
- \_\_\_\_\_，〈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故宮學術季刊》第12卷第2期，1994年冬季，頁1-20。
- \_\_\_\_\_，〈四庫全書的歐西文明曙光〉，《中文學報》第11期，2004年12月，頁35-46。
- 宋世瑞、劉遠鑫，〈「說部」與「小說」：《四庫全書總目》之小說異名狀態辨〉，《文藝評論》2016年第10期，頁56-63。
- 李飛，〈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透射出的小說理念〉，《北方文學》2010年第8期，頁88-89。
- 李國新，〈文化品性：古典目錄深層內涵的展現——評《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圖書館（雙月刊）》1993年第1期，頁68-69。
- 李榮善，《文化學引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李劍亮，〈試論《四庫全書總目》詞籍提要的詞學批評成就〉，《文學遺產》2001年第5期，頁86-93。
-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汪受寬、劉鳳強，〈《四庫全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62-66。

- 汪惠敏，〈《四庫全書提要》對宋儒春秋學評騭之態度〉，《書目季刊》第 22 卷第 3 期，1988 年 12 月，頁 71-77。
- 周積明，〈析《四庫全書總目》的西學觀〉，《中州學刊》1992 年第 3 期，頁 112-116。
- \_\_\_\_\_，〈四庫學新理解〉，收入海南大學中國四庫全書研究中心編，《四庫全書研究——中國首屆《四庫全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海口：海南大學中國四庫全書研究中心，1994 年，頁 103-104。
- \_\_\_\_\_，〈《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書目季刊》第 31 卷第 1 期，1997 年 6 月，頁 14-20。
- \_\_\_\_\_，〈《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社會科學戰線》2000 年第 3 期，頁 104-113。
- \_\_\_\_\_，〈「四庫學」：歷史與思考〉，《清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頁 50-62。
- \_\_\_\_\_，〈《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
- \_\_\_\_\_，〈乾嘉時期的漢宋之「不爭」與「相爭」——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觀察中心〉，《清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1-18。
- 季野，〈開明的迂腐與困惑的固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觀的現代觀照〉，《小說評論》1997 年第 4 期，頁 69-73。
- 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故宮季刊》第 17 卷第 2 期，1982 年冬季，頁 29-40。
- \_\_\_\_\_，〈「四庫學」的展望〉，收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i-vi。
- 林志宏，〈舊文物，新認同——《四庫全書》與民國時期的文化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7 期，2012 年 9 月，頁 61-99。

- 林穎政，〈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春秋學的評價標準〉，《經學研究集刊》第 10 期，2011 年 4 月，頁 121-152。
- 邵毅平，〈評《四庫全書總目》的晚明文風觀〉，《復旦學報》1990 年第 3 期，頁 52-57。
- 門庭，〈《四庫全書總目》與王漁洋詩學——兼論四庫館臣詩學觀〉，《圖書館學刊》2009 年第 4 期，頁 88-90。
- 姜海軍，〈清中期南北學術的分立、一統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史學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頁 18-26。
- 柳燕、彭芸芸，〈《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念探析〉，《歷史文獻研究》2014 年第 1 期，頁 346-353。
- 計文德，《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臺北：漢美圖書，1991 年。
- 凌碩為，〈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小說觀〉，《江淮論壇》2004 年第 4 期，頁 114-117。
-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2005 年冬季，頁 83-128。
- 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詞籍批評〉，《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6 年第 6 期，頁 161-164。
- 徐朋雲，〈《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述要〉，《安徽文學》2010 年第 8 期，頁 78。
- 徐燕琳，〈論《四庫全書總目》的戲曲文體批評〉，《中山大學學報》2011 年第 1 期，頁 23-31。
- 翁筱曼，〈「小說」的目錄學定位——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小說觀為視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3 期，頁 80-84。
- 袁文春，〈小說價值標準的調整與虛構的合法化——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3 期，頁

39-43。

張立文，〈中國學術的界說、演替和創新——兼論中國學術史與思想史、哲學史的分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頁1-9。

張泓，〈實學思潮與《四庫全書總目》的小說觀〉，《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68-73。

張傳峰，〈《四庫全書總目》詩學批評與王漁洋詩學〉，《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頁49-53。

許崇德，〈論政治與經學流向對《四庫全書總目》評鹭標準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3期，2007年春季，頁95-140。

許嘉璋，〈「崇實」作為一種批評方法——論《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提要呈現之文學思想〉，《淡江中文學報》第27期，2012年12月，頁225-252。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

陳東輝，〈20世紀上半葉「四庫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第25卷第2期，2006年5月，頁29-38。

陳美朱，〈析論紀昀對王士禛之詩學與結納標榜的批評〉，《東華人文學報》第8期，2006年1月，頁123-148。

陳寅恪，〈審查報告一〉，收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47年，頁1-4。

陳逢源，〈乾嘉漢宋學之分與經學史觀關係試析——以《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序》為中心〉，收入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頁141-170。

陳華文，《文化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彭池，〈傳統國學研究的新思路——評周積明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月刊》1992年第7期，頁74-77。
- 曾令愉，《〈四庫全書總目〉「公論」視野下的明代詩文》，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 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宋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輔仁國文學報》第23期，2007年2月，頁73-101。
- \_\_\_\_\_，〈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
- \_\_\_\_\_，〈林中路：《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思想研究芻議〉，《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創刊號，2010年7月，頁74-86。
- \_\_\_\_\_，〈所見與不見——《四庫全書總目》視野下的《漁洋詩話》〉，收入賴貴三主編，《中孚大有集：黃慶萱教授八秩壽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515-536。
- \_\_\_\_\_，〈涓滴成河：《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的集部國朝〈提要〉〉，《淡江中文學報》第31期，2014年12月，頁171-200。
- 曾紀剛，《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潮之關係研究：以經史二部為主的觀察》，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 程惠新、陳東輝，〈2000-2014年《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綜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6年第3期，頁67-70。
- 馮淑然、艾洪濤，〈論《四庫全書總目》的詞體美學觀〉，《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頁118-123。
-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 黃瓊誼，〈《四庫全書總目》對乾隆旨意依違之例——以集部為考察中

- 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21 期，2011 年 10 月，頁 26-51。
- 楊亞庚、王小影，〈以《清實錄》為依據看清朝中期滿語文的衰微〉，《長春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頁 80-83。
- 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上海：世界書局，1946 年。
- 楊晉龍，〈王士禛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地位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 7 期，1993 年 5 月，頁 1-31。
- \_\_\_\_\_，〈「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 期，1994 年 3 月，頁 349-394。
- \_\_\_\_\_，〈《四庫全書》訂正析論：原因與批判的探求〉，收入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337-374。
- \_\_\_\_\_，〈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評價析論其評價內涵的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6 期，2000 年 3 月，頁 523-586。
- \_\_\_\_\_，〈論《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詩經學的評價〉，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年，頁 441-477。
- \_\_\_\_\_，〈「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研究時的幾個問題〉，收入蔣秋華主編，《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17-70。
- \_\_\_\_\_，〈從「現代經濟理論」論《四庫全書總目》——經濟學及其相關概念與傳統中華文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26 卷第 1 期，2008 年秋季，頁 133-169。
- 溫慶新，〈試論政教視域下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觀念〉，《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5 年第 10 期，頁 71-74、83。
- 鄒然，〈《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學著作評論述要〉，收入中國詩經學

- 會編，《詩經研究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頁111-131。
- 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
- 廖棟樑，〈《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序》對文學批評的認識〉，《輔仁國文學報》第9期，1993年6月，頁109-131。
- 趙振祥，〈從《四庫全書》小說著錄情況看乾嘉史學對清代小說目錄學的影響〉，《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1期，頁141-148。
- 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漢學研究通訊》第2卷第3期，1983年7月，頁146-151。
- 劉美玲，〈《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有關女性著作的探討〉，《書目季刊》第37卷第2期，2003年9月，頁13-30。
- 劉貴華，〈論《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詞學思想〉，《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頁62-64。
- 劉德明，〈《四庫全書總目》的「根柢」觀探究——經學視野下的文學觀〉，收入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第六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2006年，頁543-567。
- 劉曙光，〈學術史與思想史關係的討論及其反思〉，《雲夢學刊》2006年第4期，頁9-12。
- 蔡智力，〈賦體之「式微」與文體之「滋廣」——從〈漢志〉〈隋志〉看「唐無賦」與「賦莫盛於唐」之爭〉，《輔仁國文學報》第45期，2017年10月，頁95-138。
- ，〈不使異學淆正經：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易學圖書之部次看清代易學潮流〉，收入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177-194。
- 鄧洪波、張洪志，〈2011-2015年四庫學研究綜述〉，《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31-37。
- 盧盈君，〈《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



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8年。

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1995年，冊22，頁581-588。

鍾志偉，〈平議《四庫全書總目》「假傳體」文類的編目與批評〉，《漢學研究》第32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259-292。

韓春平，〈《四庫全書總目》的小說觀及其原因探析〉，《貴州文史叢刊》2007年第1期，頁83-87。

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淡江中文學報》第18期，2008年6月，頁279-302。

\_\_\_\_\_，〈從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論「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叢聚狀結構〉，《東華漢學》第9期，2009年6月，頁1-47。

\_\_\_\_\_，〈「文學自覺說」與「文學獨立說」之批判芻論〉，收入慶祝黃錦鉉教授九秩嵩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慶祝黃錦鉉教授九秩嵩壽論文集》，臺北：洪葉文化，2011年，頁917-946。

\_\_\_\_\_，〈《詩比興系論》〉，臺北：聯經出版，2017年，頁325-407。

龐乃明，〈從四庫提要看清人歐洲觀〉，《明清論叢》2014年第13輯，頁195-205。

龔詩堯，〈《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

〔英〕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臺北：远流圖書，2003年。

〔美〕阿蘭·梅吉爾（Allan Megill）、張旭鵬，〈什麼是觀念史？——對話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阿蘭·梅吉爾教授〉，《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2期，頁108-119。

〔德〕庫爾特·考夫卡（Kurt Koffka）著，黎煒譯，《格式塔心理學原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德〕瑪克斯·韋伯（Max Weber）著，顧忠華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臺北：遠流出版，2016年。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obert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p. 51-78.

Kroeber, A. L.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ambridge, Mass.: The Museum, 1952.

## On Cultural Philology and Its Methodology: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Siku* Studies

Zhi-Li Cai\*

### Abstract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a theoretical system, *Siku* studies 四庫學 have remained in a relatively scattered condition since first being proposed in the 1980s. Recognizing this problem, this article follows Zhou Jiming's 周積明 line of thinking on cultural *Siku* studies 四庫文化學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upon it under the scope of cultural philology 文獻文化學. Follow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which introduces the issue,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 cultural philology in which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is the conditionality of the cultural field to literature, which involves bi-directional interpretative access. The methodological neglect of the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literary codes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ulturological theories is also discussed. Taking cultural *Siku* studies as an example,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ticle reflects on its status and trendlines, and analyzes its transvers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Thi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gradual turn towards culturology, and the need for even further advance.

**Key words:** cultural philology 文獻文化學, cultural *Siku* studies 四庫文化學, *Siku* studies 四庫學, *Siku quanshu* 四庫全書, reflection upon theory

---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